

符号叙述学，广义叙述学

赵淑衡

DOI:10.13564/j.cnki.issn.1672-9382.2016.02.001

叙述就是讲故事，是人类组织个人生存经验和社群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，只要人开始用符号表达意义，他们就开始用各种符号讲故事。叙述文本，就是带有情节的符号文本，而情节，笔者的浅见，是卷入人物（不一定是人，拟人也是人物）的变化。地质变化、化学变化等不能算情节，因此叙述是高度人文化的符号意义方式。无怪乎利奥塔认为，人类的全部知识可以分成“科技知识”和“叙述知识”两大类(Lyotard, 1984:43)。

符号是用来表达和解释意义的，任何意义都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，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，也没有不用符号表达的意义。文化的人生存于各种叙述化活动之中，所谓广义叙述的符号学研究，就是各种体裁叙述的普遍规律研究。任何符号都能用来讲故事，当然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、最复杂的符号体系，但是身体姿势、语调、表情、图像、心像、实物，都经常用来讲故事，心像叙述如做梦，实物叙述如演习。正由于此，各种叙述体裁遍布整个人类文化：从“叙述学”这门学科最喜欢讨论的小说和电影，到这个学科一直不愿意（或者并不心甘情愿）讨论的戏剧、新闻、广告、电视、连环画、雕塑、旅游地设计、展览布置、历史、传记、日记、卜算、预言、法庭辩词、心理诱导、角色扮演（Cosplay），甚至忏悔、检讨这样的“边缘体裁”叙述，梦境、错觉这样的心像媒体叙述，体育比赛、游戏这样貌似不像讲故事的叙述。甚至，带故事的记忆，所谓“事件化”（eventization），容易记住；事件化的营销，即是借大众知道的事件做广告，效果会好得多。叙述转向最终在医学中发生：讲故事被证明有治疗作用。进入“自然科学”，应当说是叙述能力的最终证明，科学开始人文化。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特曼特地为《文学与医学》刊物撰写了论文“叙述及其后果”（Hartman, 2004: 334-345）。

萨特强调生存等同于讲故事：“人永远是讲故事者：人的生活包围在他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，他通过故事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，他自己过日子像是在讲故事。”（Sartre, 1967: 12）波德维尔指出叙述不仅是我们有意识地讲述，它经由文化熏陶，已经成为我们心灵无意识的意义方式：“即使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也不能避开故事，因为我们经常像体验小型叙述一样经历我们的梦，并且用故事的方式回忆和复述它们。或许，叙述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个基本途径。”（Bordwell, 1985: 82）

要逐个讨论这些叙述体裁的形式特征，不是非常困难的课题，它们都没有小说那么复杂，看起来只要把小说叙述学改造移植过去，大致上可以解决问题。但是要提出能覆盖所有这些体裁的广义的叙述规律，就非脱离以小说为核心模式的叙述学不可。建立广义符号叙述学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，并不是纯学理的压力，更是文化实践的进展。近几十年来人类文化中出现了一个明确的“叙述转向”：许多不被认为是在讲故事的表意行为，我们意识到实际上是在讲故事，这在心理学、新闻学、人类学、法学等学科中特别明显。

叙述转向，从20世纪50年代的“新新闻主义”和六七十年代的“新历史主义”开始萌生，在90年代终于形成声势，遍及上面说到的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，而到新世纪开始出现总结性的著作，例如布鲁纳2002年的《编故事：法律、文学、生活》（Bruner, 2002）、雷斯曼2008年的《人类科学中的叙述方法》都试图跨越学科寻找叙述化的规律（Reissman, 2008）。

许多学者认为近年批评界的重要趋势是“伦理转向”（ethical turn）。这两个转向是什么关系？叙述转向看起来是个形式问题，伦理转向则强调意识形态，它们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正是因为叙述化，才彰显了人文的伦理问题。因为故事情节，尤其是故事的结尾方式，必须包含道德，才能以伦理目的贯穿人类经验：叙述的目的，首先是传达一个道德意义。1995年文学批评家

（⇒ 32）

(上接扉页)

牛顿的著作《叙述伦理》已经提出二者合一(Newton, 1995)。叙述学家费伦在与中国学者唐伟胜的对话“伦理转向与修辞叙述伦理”中也提出:二者是同一个转向的两个方面(Tang, 2007: 3)。

出现“叙述转向”的领域,基本上都是以展示“真相”为己任的领域,不可能摆脱伦理考量。“真相”独立存在的观念早已过时,但是意义依然需要包含“有效性”(validity)。由此,“真实性”就变成了“故事的可信度”问题。存在经验“有意义地联系”(meaningfully interconnected),可能只有叙述才能表现。因为在情节化过程中,叙述主体不得不进行挑选和重组。“叙述化”,即在经验中寻找“叙述性”,就是在经验细节中寻找秩序、意义和目的,把它们“情节化”地构筑成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。一旦情节化,人就能在事件序列中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。叙述就成为构造人类的“时间性存在”和“目的性存在”的语言形式。(Polkinghorne, 1995: 5-13)

这样一来,叙述学就不得不承受压力,面对既成事实来改造自身:既然如此多体裁被认为是叙述,而且是重要的叙述体裁,那么叙述学不得不自我改造:不仅要有各种门类叙述特点的分析,而且必须有能提出总体规律的广义叙述学理论。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在做门类叙述学,至今已经有很多成果。他们的实践证明,门类叙述研究不是简化小说叙述学就能完成的:许多门类的叙述引出的问题,不是以小说为基本模式的叙述学所能解答的。

有一批叙述学家已经在接受这个挑战:他们提出的叙述研究新方案,逐渐逼近了“符号叙述学”。欧洲学界关于“自然”与“非自然”叙述的讨论,触及了各种叙述的根本性特征(Fludernik, 1996);瑞恩提出,网络文化要求一种“跨媒介叙述学”(Ryan, 2006: 9)。中国学者近年的贡献也不少,例如赵宪章关于图文叙述的研究、傅修延关于青铜器铭文与图案叙述的研究等(傅修延, 2008: 5)。

巴尔敏锐地指出,有两种叙述学:“文学叙述学属于诗学,非文学叙述学属于文本学”(Bal, 1984: 7);里蒙-基南同意这个观念,但是指出:更准确地说,应当是“非文学叙述学属于符号学”(Rimmon-Kenan, 1983: xi)。他们都体会到只有符号学能处理一般叙述研究,但是这样一门学说一直没有能建立。2003年汉堡“超越文学批评的叙述学”讨论会上,涌现了一批出色的论文,但是主持者也坦承总框架没有能突破文学叙述学(Meister et al., 2005);施密德的叙述学新作依然认为“文学研究之外很难有独立的叙述学范畴”(Wolf, 2010)。

另一方面,符号学家也在渐渐逼近符号叙述学的概念。符号学界很早觉察到一般叙述研究应当是符号学的任务: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尝试提出“一般叙述语法”(Greimas & Courtés, 1979),许多符号学家明白指出:一般叙述学即是符号叙述学(Noth, 1995)。

近年,国际学界都已经感到这项任务已经迫在眉睫,已经开始产生相应的动态:国际“叙述文学研究协会”于2009年改名为“叙述研究学会”(ISSN);而欧洲叙述学网络(ENN)于去年出版了大规模的网上版“活的叙述研究词典”,鼓励学者参与网上补充扩容。

因此,一门广义化的、覆盖全部叙述体裁的“符号叙述学”,在国外、在国内,都已经呼之欲出。尽管目前出现的各种方案相当零乱,但学出多源,可以避免过早定于一尊。我们可以看到,广义符号叙述学并不抛弃传统叙述学,相反,从全新的理论框架看问题,叙述学的一些基本范畴,在一般共性背景上会得到更透彻的理解;恰特曼则指出:要理清小说与电影的异同,只有依靠“合一的一般叙述学”(Seymour, 1990: ii)。而对于一些“边缘”叙述体裁,则需要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学理模式打通题材边界,已经不能再等。

这应当是叙述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契机,但从目前局面看来,这却给叙述学界带来窘困。所谓“新叙述学”,又名“多种叙述学”(narratologies)、后经典叙述学,或后现代叙述学,意思是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。但是“新叙述学”有没有意愿为广义的叙述提供一个通用的理论基础呢?

对此,叙述学家各有不同的回应方式。赫尔曼在为《新叙事学》写的引言中认为:“走出文学叙事……不是寻找关于基本概念的新的思维方式,也不是挖掘新的思想基础,而是显示后经典叙事学如何从周边的其他研究领域汲取养分。”(戴卫·赫尔曼, 2002: 18)看来“后经典叙事学”依然以小说为核心体裁,其他各种叙述体裁只能“提供养分”。

另一位新叙述学重镇弗卢德尼克更进一步认为,“非文学学科对叙事学框架的占用往往会削弱叙事学的基础,失去精确性,它们只是在比喻意义上使用叙述学的术语。”(莫尼卡·弗卢德尼克, 2007: 40-41)笔者的看法正相反:叙述转向,使我们能够在人类意义经验构成的大背景上考察叙述,一旦做到这一点,将会是小说叙述学“比喻地使用”广义符号叙述学。

因此,建设一门广义叙述学,是世界叙述学界没有能成功地面对的任务。在叙述转向发生后,这个任务已经迫在眉睫。而这个重大课题的解决方案,必然是充分利用符号学的资源,因为叙述学本来就是将符号学应用于叙述。一旦把所有的符号媒介创造的叙述都包括在视野之中,许多叙述学问题就有了一个崭新的审视角度(文一茗,2012: 62-71);而许多文化现象,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层出不穷的新体裁,也被看作是叙述而获得全新的理解(陈新儒,2015: 60-67)。因此,一门广义叙述学,不可避免地是符号叙述学。而且这样一门广义的叙述学,能够反过来刺激文学叙述新的研究方法(刘俐俐,2015: 1-16)。

笔者(2013)试图在《广义叙述学》中勾勒出最根本的框架。笔者提出的各种叙述体裁分类沿着纵横两条轴线展开:一条轴线是再现的本体地位类型,即纪实型诸体裁和虚构型诸体裁;另一个轴线是媒介-时向方式,媒介与时向在这个分类上相通,媒介分类与时间意向分类实际上是一致的。

这个新学科领域如此广阔,一本薄书当然不可能完成其建设,笔者能做到的,只是提出这个任务,等待年轻的一代学者(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)比较圆满地完成这个任务。

(作者简介:赵毅衡,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,教授。研究方向:符号学、世界文学。
E-mail:zhaoyiheng2011@163.com。)

参考文献

- [1] Bal, Mieke. *Narratology: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*[M]. Toronto: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, 1984.
- [2] Bordwell, D. et al. *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Film*[C]. New York, 1985: 82.
- [3] Bruner, J. *Making Stories: Law, Literature, Life*[M]. New York: Farrar Straus Giroux, 2002.
- [4] Greimas, A. & Courtes, J. *Semiotics and Language: An Analytical Dictionary*[M]. Bloomington, IN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79.
- [5] Hartman, G. Narrative and beyond[J]. *Literature and Medicine*, 2004(Fall): 334-345.
- [6] Lyotard, J. F. *The Post-Modern Condition: A Report on Knowledge*[M]. Manchester: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, 1984.
- [7] Fludernik, Monika. *Towards a "Natural" Narratology*[M]. London: Routledge, 1996;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, 1984: 34.
- [8] Meister, J. C. et al. *Narratology Beyond Literary Criticism: Mediality, Disciplinary, Papers Presented at a Symposium Held in Hamberg*[C]. Berlin: Gruyter, 2005.
- [9] Newton, A. Z. *Narrative Ethics*[M]. 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95.
- [10] Noth, Winfred. *A Handbook of Semiotics*[M]. Bloomington: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, 1995.
- [11] Polkinghorne, D. E. Narrative configuration in qualitative analysis[A]. In J. A. Hatch & R. Wisniewski (eds). *Life History and Narrative*[C]. London: Falmer, 1995: 5-13.
- [12] Reissman, C. *Narrative Method in Human Sciences*[M]. Thousand Oaks, CA: Sage, 2008.
- [13] Rimmon-Kenan, Shlomith. *Narrative Fiction: Contemporary Poetics*[M]. London & New York: Methuen (New Accents), 1983: xi.
- [14] Ryan, Marie-Laure. *Avatar of Story*[M]. Minneapolis: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2006: 9.
- [15] Sartre, Jean-Paul. *Nausea*[M]. New York: Penguin Modern Classics, 1967: 12.
- [16] Seymour, C. *Coming to Terms: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*[M]. Ithaca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, 1990: ii.
- [17] Tang, Weisheng. The ethical turn and rhetorical narrative ethics[J]. *外国文学研究*, 2007(3).
- [18] Wolf, Schmid. *Narratology: An Introduction*[M]. Berlin: Gruyter, 2010.
- [19] 陈新儒. 反讽时代的符号狂欢: 广义叙述学视域下的网络弹幕文化[J]. *符号与传媒*, 2015(11): 60-67.
- [20] 戴卫·赫尔曼. 引言[A]. *新叙事学*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2: 18.
- [21] 傅修延. 试论青铜器上的“前叙事”[J]. *江西社会科学*, 2008(5).
- [22] 莫妮卡·弗卢德尼克. 叙事理论的历史(下): 从结构主义到现在[A]. *当代叙事理论指南*[C]. James Phelan等主编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7: 40-41.
- [23] 刘俐俐. 文学研究如何面对广义叙述学出现的机遇和挑战[J]. *符号与传媒*, 2015(11): 1-16.
- [24] 文一茗. 不可靠叙述的符号学研究[J]. *符号与传媒*, 2012(4): 62-71.
- [25] 赵毅衡. *广义叙述学*[M]. 成都: 四川大学出版社, 2013.